

##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色列“新旧历史学家”争论及其影响\*

——以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为中心

柏悦\*\*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学界涌现出了一批极具批判性的“新历史学家”，他们对官方史学文本进行了解构，更有甚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变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斥着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剥削和迫害。面对新历史学家对现存叙述体系的挑战，“旧史学家”竭力维护以色列官方史学，强调犹太复国主义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双方各执己见，引发的“新旧历史学家”争论绵延至今。尽管官方史学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新历史学家重新解读以色列—巴勒斯坦历史促成了以色列多元叙事的回归，然而一些激进主张未免过犹不及。以色列学界应当更为理性审慎地思考改变共识缺席的现状，以期进一步地以学术推动巴以和平。

**关键词** 新历史学家 犹太复国主义 殖民主义 史学争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色列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修正主义流派，泛称“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新历史学家声称旨在发现迄今被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家淡化或压制的真实历史，根据解密后的美、英、以等多国政府档案文件重新审查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历史，更有一些史学家走访了经历过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事件的健在目击者和当事人。新历史学家据此撰写了一批著述，主要观点包括巴勒斯坦难民并不是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专项“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新兰克学派史学家群体研究”（20CSS003）的阶段性成果。

\*\* 柏悦，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史。

自愿离开故土，而是被驱逐的<sup>①</sup>等，为此新历史学家还被称为“殖民主义者学派”（Colonialist School）。<sup>②</sup>另外，持有官方主流观点的“传统史家”或者“旧史学家”（Old Guard of Traditionalist Court Historians）亦指控新历史学家全盘接受了倾向巴勒斯坦方面的叙述，妖魔化以色列建国的性质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新历史学家所运用的某些口述史方法也令人怀疑。对于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以色列“新旧历史学家”之争，国内学界已经有所关注，<sup>③</sup>但对于其中最具争议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一命题叙述较为简略，而这一命题直接引发以色列学界最严重的分歧，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意见。这一争议是以色列史学研究规避不开的现象级事件，本文从争论展开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为出发点，厘清新旧学派的学术立场，延伸争论中涉及的诸多概念并对之进行阐释，以扩充国际范围内的例证，这对于梳理以色列史学的发展脉络，进一步认识当下的以色列政治生态、巴以关系等问题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 一 殖民主义还是复国主义：“新历史学家”的出现与史学之争

犹太复国主义是指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迦南地区）重建自己国家的愿望与行动。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争议并不是以色

① Avi Shlaim, “The War of the Israeli Historians,” *Annales Oxford University*, Vol. 59, No. 1, 2004, pp. 161–167.

② Avi Bareli, “Forgetting Europe: Perspectives on the Debate about Zionism and Colon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2, 2001, p. 99.

③ 新历史学家与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密切，后犹太复国主义指的是一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主张以色列向非意识形态的、世俗的、自由民主国家演变，发展为一个既不打上犹太人标签，也不打上阿拉伯人烙印的普适国家，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是犹太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犹太右翼力量也使用该术语来指代以色列左翼政治力量。国内关于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以色列新史学家的相关研究包括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王铁铮《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以〕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杨阳《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李晔梦《“新历史学家”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姚惠娜《本尼·莫里斯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张倩红、韩博雅《“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列新历史学家的发明,世界范围内的政界、学界人士曾就此发出不同的声音,涉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性质的讨论。早在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移居的第一代代表莫西·斯米兰斯基(Moshe Smilansky)认为“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对巴勒斯坦土著人民的普遍态度从冷漠、无视转向高人一等的优越感”。<sup>①</sup>此外,印度独立领导人甘地在1938年表示过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信任,他认为“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就像英格兰属于英国人、法兰西属于法国人一样。犹太人驱赶阿拉伯人,造成阿拉伯人口的锐减,让巴勒斯坦地区部分或完全成为犹太人的家园是错误的和不人道的。犹太人只有依靠阿拉伯人的善意才能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应设法感化阿拉伯人”。<sup>②</sup>但也有伊拉克国王、阿拉伯民族运动领袖埃米尔·费萨尔(Emir Faisal)对犹太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希望犹太人回到家园,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阿拉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同路人,“两场运动彼此缺少任何一方都不会真正地成功。犹太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帝国主义的”。<sup>③</sup>20世纪50年代,波兰犹太裔学者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则认为逐出了150万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已成为20世纪“最后残留的殖民大国”。<sup>④</sup>而在当前以色列官方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中,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善行,是带有美好意义的、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其本质及主流来看,是一场世俗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sup>⑤</sup>而“其他任何对立的叙事模式都是禁忌”。<sup>⑥</sup>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政治气候、社会思潮以及学术氛围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成为以色列历史书写的分水岭,铁板一块的以色列历史叙事模式开始出现松动。

- 
- ① Nur Masalha, “New History, Post-Zionism and Neo-Colonialism: A Critique of the Israeli ‘New Historians’,” *Holy Land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0, No. 1, 2011, p. 12.
  - ② William R. Slomanson, *Fundament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0, p. 50.
  - ③ Samuel Katz, *Battleground-Fact and Fantasy in Palestin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7, p. 55.
  - ④ Tariq Ali, *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 Crusades Jihad and 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2003, p. 124.
  - ⑤ 张倩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代审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 ⑥ Michel Ben-Josef Hirsch, “From Taboo to the Negotiable: The Israeli New Historians and the Chang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2, 2007, pp. 241–258.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地区事务中的强势地位所产生的效应随着 1982 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到达新的顶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Menachem Begin) 宣称入侵黎巴嫩是对 20 世纪 40~50 年代开国元勋大卫·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政策的延续”,<sup>①</sup> 在此背景之下学界大为震动。同年以色列政府还公开了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档案, 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尤其是一批“新历史学家”挑起了对以色列建国的争议, 要求重新解读以色列史。

争议之声之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旧调重弹”, 还归因于以色列的私有化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在西方史学界多元叙事成熟期内个人主义精神、多元文化主义等新思潮层出不穷, 一批成长于更加开放、充满质疑和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学术环境之中的年轻学者纷纷涌现。需要注意的是,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 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为殖民主义的声音更早地来自阿拉伯人和西方左翼学者, 一些新历史学家接受这一话语正是因为他们敢于颠覆传统, 急于抒发新观点, 最终将矛头对准了把持以色列教育系统 and 史学话语的旧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想要突破以色列官方的一元叙事架构, 打破历史意识反映单一社会群体观点的现状, 认为不论派别、不论精英抑或非精英都可以发声, 各个群体都可以掌握自己为主体进行历史叙事的权利。

新历史学家的领军人物本尼·莫瑞斯 (Benny Morris) 宣称新历史学家领导并开启了一场以色列的“史学革命”。<sup>②</sup> 尤其是新历史学家中的殖民主义派将矛头直指犹太复国主义的正确性, 认为“与其他任何民族运动相比较, 犹太复国主义具有更多的两面性: 一方面,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犹太人反抗压迫和迫害的民族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 从其复国计划来看, 它对本土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剥削和排斥, 又使它在组织和发展形式上成了一个殖民国家。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异质性, 在犹太复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 其主要动力就是掠夺和驱逐巴勒斯坦人, 并利用各种时机尽可能地控制巴勒斯坦的各种资源, 从而达到建国的目的”。<sup>③</sup> 犹太人向巴

① Tor Øyvind Westb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s New Historian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Master Thesis, History,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Hist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Religion-AHKR, 2012, p. 44.

② Benny Morris, *Making Israel*,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p. 1, 13-14.

③ 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巴勒斯坦的移民应该被看作欧洲殖民者的侵略,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继续充当大英帝国的利益联盟。<sup>①</sup>

在一般的历史语境中,殖民主义是充满负面消极意涵的历史概念,“殖民扩张(也称为帝国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对军事力量或贸易路线的控制积累海外资源,殖民主义定居者的目的是在新的领地建立永久性居所,享有特权,其生活水准超过了土著居民。殖民主义定居者积极收买土地并造成了人口的重新分布,手段通常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排斥、驱逐或消灭土著人民”。<sup>②</sup>所以新历史学家将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引发了以色列学界近40年的轩然大波。

## 二 “新”与“旧”的交锋:两派代表历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与旧历史学家针锋相对,两派人物相继登场,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代表“新”与“旧”两股势力的学术观点激烈碰撞,构成了争论中最主要的环节。

### 一) 旧历史学家的观点

被新历史学家斥为旧历史学家是以色列正统史学的主流势力,以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 School)为主要代表。“他们主导了以色列建国前后官方的正统历史叙述,倡导的历史观念由于契合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快进入公众意识层面,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后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广而在各级教育体系中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历史叙述’,通常也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史学’(Zionist Historiography),他们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民族有机体,主张以巴勒斯坦故土为中心重新解释犹太历史,同时,忽略和抹除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痕迹。”<sup>③</sup>旧历史学家塑造了两三代以色列人的国民历史意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受到来

① Avi Bareli, “Forgetting Europe: Perspectives on the Debate About Zionism and Colon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2, 2001, p. 99.

② Caroline Elkins, Susan Pedersen, e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jects, Practices, Legac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2.

③ 详见艾仁贵《“耶路撒冷学派”与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自新历史学家的挑战后，其压倒性的影响力才逐渐减弱。总的来说，旧历史学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殖民主义特点，犹太复国主义是被驱逐、被迫的产物，所做的是无利可图的项目，面对的是贫穷的、没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域。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研究专家沙巴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坚称本-古里安从未煽动巴勒斯坦移民；<sup>①</sup>著名历史学家安妮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以及冉·亚伦森（Ran Aaronson）等认为“从巴勒斯坦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定居机制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无辜清白的国家项目，不存在任何殖民主义的动机”。<sup>②</sup>

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研究中心教师艾维·巴雷利（Avi Bareli）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巴雷利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拥有的土地上建立的定居点不仅不是殖民据点，反而是为了防止殖民主义剥削社会而生成的，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巴雷利还另辟蹊径，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出殖民主义学派没能构成一个严密的因果逻辑网络。他认为新历史学家忽视了犹太人移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具体进程，只是不厌其烦地运用了殖民主义话语和文本分析，沉迷于阐释意识结构和表达形式以误导读者。但实际上殖民主义集地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于一身，尤其聚焦于经济。而新历史学家忽视了殖民主义的经济本质，不做分析随意给犹太复国主义贴上了殖民主义的标签。此外，巴雷利认为殖民主义学派的方法缺乏理性基础，忘记了外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存在，掉入了“巴勒斯坦中心主义”（Palestinocentric）的陷阱之中，臆想出一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小说”。然而巴雷利也不忘反思，承认殖民主义学派不仅是当代以色列社会的产物，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政治社会之下的精神变体。他认为，殖民主义学派的发展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巴以现实政治关系的痛苦反馈，难以视而不见的是在以色列社会中依然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感到不安、怀疑甚至否定的人群。<sup>③</sup>

① 参见 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s: From Peace to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Ben-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20, No. 2, 2008, p. 613.

③ Avi Bareli, "Forgetting Europe, Perspectives on the Debate about Zionism and Colon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2, 2001, pp. 100-101, 108, 115.

莫迪凯·巴龙(Mordechai Bar-On)是旧历史学家中的调和派代表。<sup>①</sup>他是1948年战争的亲历者,曾担任摩西·达扬(Moshe Dayan)的私人秘书,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22年,之后成为希伯来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和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eace)下属的特拉维夫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还是以色列著名的“现在实现和平运动”(Peace Now Movement)的倡导者。巴龙认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不是殖民运动的讨论超越了诽谤或是污蔑的简单阶段,即便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辩护人也不得不解释,从某些方面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像是一种“特殊的殖民主义”。他甚至承认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特质到达顶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多处运用了“殖民的”这一话语,并不是无意识的,而且也毫无羞愧感。1948年1~2月的暴力升级与流血冲突就像是一出典型的、恶性循环的希腊式悲剧,如同宿命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sup>②</sup>诚然,莫迪凯·巴龙肯定“新历史学家在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具有建设性的自我批判的试验”,但他又谴责一些学者忘记了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以至于沉浸在学术研究中,过度自我批判而走向极端,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了犹太人一方,没有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调查冲突的内在根源。大多数的犹太民众并不欢迎这种史学发展趋势,毕竟长期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的偏见无法放弃,至于一些极端的新历史学家重构的叙事更让民众无法接受。<sup>③</sup>海法大学教授丹尼尔·古特文(Daniel Gutwein)也持类似的观点,“新历史学家的创新不在于研究,而是在政治意义上做文章,反复挑动公众的神经。新历史学家不质问以前的研究,而质疑并试图修正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构建另一种承载道德负罪感的集体记忆”,<sup>④</sup>如此一来记

① 参见 Mordechai Bar-On, “Mordechai Bar-On: The Peace Movement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4, No. 3, 1985, pp. 73–86。

② Mordechai Bar-On, “Conflicting Narratives or Narratives of a Conflict: Can the Zionist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the 1948 War Be Bridged?” in Robert I.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4–146, 152.

③ Mordechai Bar-On, “Conflicting Narratives or Narratives of a Conflict: Can the Zionist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the 1948 War Be Bridged?” Robert I.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55.

④ Daniel Gutwei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Memory,” in Yechiam Weitz, ed., *From Vision and Revision: One Hundred Years of Zionist Historiography*, Jerusalem: The Ialman Shazar Center, 1994, pp. 316, 324.

忆成为身份的战场，誓要开展一场争夺谁是受害者、谁是被害者的竞赛。

## （二）新历史学家的观点

相对旧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则是一个成分更为复杂的群体，其中最著名的三个人物是本尼·莫瑞斯、阿维·史莱姆（Avi Shlaim）和艾兰·佩普（Ilan Pappé）。其中艾兰·佩普最为激进，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关系的思考也最为深入。艾兰·佩普早年就读于希伯来大学，1984年获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以色列，成为海法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他旗帜鲜明地表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锡安主义一直是个民族情感激昂的殖民计划”，<sup>①</sup>“它在道义上应受到责难，并带有先天性的弊病，这正是今天以色列面临国内外困境的主要原因”。<sup>②</sup>

首先，艾兰·佩普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从“自我形象、话语和实践三个方面”考察后得出结论，不论动机或意图，犹太复国主义者显然是殖民主义者或者已沦为殖民主义者的工具。在巴勒斯坦地区“没有什么能与犹太复国主义带来的殖民主义力量相比，虽然早期移民人数不多，但事后来看就是殖民的开始……像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一样，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当地的利益进入巴勒斯坦的运动。殖民者把当地人看作可以利用的商品或资产，或是要铲除的障碍”，<sup>③</sup>所谓象征集体生活美好愿望的基布兹公社则是犹太人为换取经济和土地利益，把当地人民当作假想敌的堡垒。<sup>④</sup>

艾兰·佩普还经常援引一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言论证明他的观点。如19世纪末，来自德国的定居者赫尔曼·古特（Hermann Guthe）将犹太复国主义形容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Friedlichen Kreuzzuges），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一直以经营土地项目的方式处理征地问题，这正是殖民主义者的显著特征。而这两个团体都堂而皇之地将对土地的追逐描述为“救

① [以]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29~130页。

② 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

③ [以] 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22页。

④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p. 614.

赎”。再如 20 世纪初犹太领导人雅各布·拉比诺维茨 (Yaakov Rabinowitz) 提议应建立种族隔离的殖民主义者劳动力市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应捍卫犹太工人的利益,反对阿拉伯人,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保护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免受当地人的侵害”。<sup>①</sup>

持有类似观点的包括海法大学讲师阿萨德·加尼姆 (As'ad Ghanem), 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 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割裂的殖民国家,旨在以犹太移民和非犹太移民取代土著居民。1948 年以后的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待遇没有体现出任何民主的原则,作为核心制度的公民权话语和教育体制显现出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同样,以色列政治机构一直使阿拉伯人远离国家决策制定和国家资源分配过程,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经济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发展独立经济的前景”。<sup>②</sup>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耶胡达·申哈夫 (Yehuda Shenhav) 还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复国主义者 (Ashkenazi Zionist) 以所谓文化优势抑制从阿拉伯国家移民来的犹太人原本的阿拉伯身份认同。<sup>③</sup> 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移民以米兹拉希姆 (Mizrahim) 即东方犹太人命名,置于西方犹太人之下,是以色列的二等公民,同时也是在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社会思潮中对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移民的贬损。

其次,艾兰·佩普提出“犹太复国主义会导致种族清洗”。<sup>④</sup> 他认为由于殖民主义不仅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行为模式,这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相似,都强调“回归”概念。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来说,“回归”一方面为了文明进步和启发土著人民重塑家园;另一方面,返回土地以创造一个纯粹的新来者至上主义国家。但这两者根本无法调和,<sup>⑤</sup> 佩普直言前者只是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真实的居心只是为了占领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土地并进行

①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p. 618.

② As'ad Ghanem, “Understanding the Divide: Arabs and Jews in Israel,” in Eliezer Ben-Rafael, Julius H. Schoeps, Yitzhak Sternberg, Olaf Glöckner, Anne Weberling, eds., *Handbook of Israel: Major Debates*,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pp. 784, 791.

③ Mordechai Bar-On, “Conflicting Narratives or Narratives of a Conflict: Can the Zionist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the 1948 War be Bridged?” in Robert I. Rotberg, ed.,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Narratives of Conflict: History's Double Helix*,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2.

④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p. 88.

⑤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p. 624.

种族清洗，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锐减。

阿维·史莱姆也慨叹犹太复国主义者充满了对原住民的深刻敌意和蔑视，他列举犹太政论家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在 1891 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侵略行为和政治民族中心主义，“以敌对和残酷的方式对待阿拉伯人，不公正地侵略他们的土地，无理由地殴打他们，甚至吹嘘这些做法，没有人立即制止这种蔑视和危险的倾向，因为犹太人认为阿拉伯人唯一懂得的语言是暴力”。<sup>①</sup>即便是观点最为温和、坚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本尼·莫瑞斯在被问及巴勒斯坦人从利达（Lydda）和拉姆勒（Ramle）被驱逐的问题时，他也承认仅针对这一事件，如果要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两个词中进行描述，他选择前者，而且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两个词同样有消极的喻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批评犹太复国主义不公平地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驱逐巴勒斯坦人。<sup>②</sup>

最后，佩普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具有英国—以色列共同施加的双重殖民性质。一些旧历史学家认为犹太人没有公认的殖民母国，复兴运动也没有一般殖民过程中形成的繁荣大都市，何来殖民主义之说？但佩普认为犹太人的殖民主义背后有英国撑腰，犹太人相当于英国人放在巴勒斯坦的卫星，英国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兴建经济飞地、设立具备独立行政基础设施的地方区划、拥有自治的教育体系等等，而英国人只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最低经济保障，多数巴勒斯坦人接受的只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对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保护和促使其进步只不过是虚假的承诺。<sup>③</sup>

① Avi Shlaim, "It Can Be Don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16, No. 11, 1994, pp. 26–27.

② 详见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4; 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South End Press, 1999, pp. 153–154; Cheryl Rubenberg, *The Palestinians: In Search of a Just Peac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 162; 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old Type Books, 2003, pp. 418–419; Steven George Salaita, *The Holy Land in Transit: Colonialism and the Quest for Cana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4. 有学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造成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甚至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例如 1948 年的代尔亚辛村大屠杀，1982 年的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大屠杀（也称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以及 1994 年的先祖之洞大屠杀（也称易卜拉欣清真寺大惨案）。

③ Barbara J. Smith, *The Roots of Separatism in Palestine: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20–1929*,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35–159;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p. 630.

总之，艾兰·佩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天主教徒、新教徒的殖民主义相比，展现出了一种非传统的形态。尽管在接管土地方式上各种殖民主义并无二致，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实践被现代化和宗教道德之类的话语体系所掩盖，后来甚至完全逆转形象，摇身一变为反殖民者或受害者，再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稀释其殖民主义性质。佩普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当地人民？同处一个世界，一部分人的自然权利完全否定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然权利，即使他人在这个地方居住超过了1000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殖民主义工具来实施战略和实现远景，迫害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普适方法论、中立术语和比较视角可以对犹太复国主义现象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光谱分析，结论是两者不仅紧密相关，而且都对巴勒斯坦的原住阿拉伯人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或有希望的承诺”。<sup>①</sup>

但佩普也明白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以色列无法轻易被接受。在传统史学阐释模式根深蒂固的以色列，尚不论学术界人士，即便是普通民众也不能接受这种声音，佩普最终被迫辞职，辗转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进入21世纪头10年，新历史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且学术观点逐渐相左，最终分道扬镳。本尼·莫瑞斯的思想更加松动，做出了一些让步的声明，同时重新解释犹太复国主义，进一步强调历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伤害是平等的。

### 三 新旧史学家之争的核心议题

由于涉及“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纷繁复杂的学理概念，新旧历史学家非常注重与之相关的概念术语被征用以及更新迭代的具体状况，并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 （一）“殖民化”还是“殖民主义”？

以色列旧历史学家重视区分殖民化（colonization）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两个术语。冉·亚伦森通过案例与理论的文献分析，再比较19世纪

<sup>①</sup> Ilan Pappé, "Zionism as Colonialism: A Comparative View of Dilute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Africa,"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 107, No. 4, 2008, p. 632.

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认为“‘殖民化’是地理现象，其本质是移民，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建立移民定居点，区别于旧的传统定居点；而‘殖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现象，其特征是超越领土的边界对一个国家的领土及其人口的奴役和剥削，体现在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将被征服的领土转化为殖民地”。冉·亚伦森认为两个概念之间没有结构性重叠，完全有可能只有殖民化而不存在殖民主义，例如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到阿根廷的事例；但也有可能存在殖民主义，但没有殖民化，比如法国对摩洛哥的情况。

在旧历史学家眼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只是“殖民化”行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第一批犹太定居者称自己为“殖民者”（colonist），将安置场所称为殖民地（colonies），指定的中央金融机构称为“殖民地信托”（Colonial Trust）。冉·亚伦森认为这些冠以前缀“colon”的术语在具体时代背景下都是中性的，没有负面含义，首先犹太定居者将巴勒斯坦地区视为宗教圣地和由来已久的家园，其动机是积极正面的。其次，旧历史学家强调犹太人的财富总是单向流入巴勒斯坦。在第一次阿利亚回迁时期，犹太人雇用了当地居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引入了大量资金，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例。埃德蒙·罗斯柴尔德（Edmund Rothschild）将大量资金投入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地”（Eretz Israel），大大超过了犹太人在其他地方投入的总和，而且赚得的金钱或资源没有流回法国，没有任何事实证明罗斯柴尔德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试图牟取暴利的隐藏资本家。“犹太人自治经济也在第一次阿利亚时期发展起来，不存在武力征服、经济剥削和权力控制，没有享有其他殖民统治国给予的特权，犹太人反而遭遇法律和行政方面的诸多障碍，这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保护殖民主义定居者形成了鲜明对照。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抗与法国和意大利殖民主义者的征服直接相关，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移民在当时没有引发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即便有也只是零星的个别行为。旧历史学家认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长期遭受苦难的根源要从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普遍存在的安全危机中寻找原因。”<sup>①</sup>

与此同时，旧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在谈及殖民主义时，总会陷入线性、

<sup>①</sup> Ran Aaronsohn, “Settlement in Eretz Israel — A Colonialist Enterprise? ‘Crit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Israel Studies*, Vol. 1, No. 2, 1996, pp. 217–219, 222.

单薄和情绪化的迷雾之中,尤其“新历史学家完全忽略了‘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区别,非常随意地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互换使用”。<sup>①</sup>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就犯了上述错误,他不严谨地将殖民主义简单地定义为“在遥远的地方植入定居点”。对此新历史学家希伯来大学教授巴鲁克·基姆林(Baruch Kimmerling)认定犹太复国主义是领地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混合物,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宣扬自身“传教士和社会主义色彩,自然不会在话语体系中公开自己隐晦的殖民主义意图”。<sup>②</sup>

## (二) 后殖民主义—后犹太复国主义概念之争

在英美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理论之所以被冠以“后”,是脱胎于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并以此为研究视角。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后殖民主义—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学术背景有所不同,以色列既不属于第三世界,也基本没有受到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因此在以色列“后”的学术体系建立之前没有“反”的学术体系。“后犹太复国主义”直接产生于犹太复国主义之上,主要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巴勒斯坦人遭受暴力、流亡,随后还被剥夺了返回土地的权利,而后又在1948年和1967年战争期间失去更多的财产。<sup>③</sup>也正是在新旧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逐渐涌现,继而形成了具有以色列特点的后殖民史学(Postcolonial History)<sup>④</sup>。

① Ran Aaronsohn, “Settlement in Eretz Israel—A Colonialist Enterprise? ‘Crit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Israel Studies*, Vol. 1, No. 2, 1996, p. 218.

② Baruch Kimmerling, *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3.

③ 犹太复国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一是1948年的大灾难,以色列版图内的巴勒斯坦人相继沦为难民,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内转而成为受军事当局管制的少数民族;二是1967年的战争,以色列用武力征服并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剩余部分,致使其居民无家可归。Nur Masalha, *The Bible and Zionism: Invented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Post-Colonialism in Palestine-Israel*,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p. 314; Nādīra Shalhūb Kifūrkiyān, *Militariz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onflict Zones in the Middle East: A Palestinian Case-Stud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 Paul Scham, Walid Salem, Benjamin Pogrud, *Shared Histories: A Palestinian-Israeli Dialogue*, New York: Left Coast Press, 2005, p. 87.

④ 后殖民史学主要关注传统历史研究所忽视的边缘文化、底层话语和本土知识,捕捉被传统史学忽视的历史经验,鲜活地呈现殖民活动引发的暴力、惊恐与创伤,为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提供可能。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被视为破坏以色列民族精神氛围的始作俑者。<sup>①</sup> 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图维亚·弗里林 (Tuvia Friling) 认为“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形成了一种邪恶联盟,他们联合起来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西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们统一口径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新十字军”(New Crusader)。一旦代入这样的设定,身处弱勢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与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做斗争的范例,就完全呼应了某些偏见,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方法论和政治上更倾向于将历史视为英雄传奇,而没有研究历史的复杂性。<sup>②</sup>

哈佛大学教授德里克·彭斯拉 (Derek Penslar) 认为 1948 年之前,“尽管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官员几乎没有怀疑过他们的事业具有欧洲殖民主义的性质,他们没有想过驱逐阿拉伯人使其成为敌人或奴役以牟利。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将巴勒斯坦农民视为粗鲁和落后的野蛮人,这一事实上的歧视与压迫被道德和物质的强烈优越感所覆盖了”。即便如此,彭斯拉认定 1948 年之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运行公式不同,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但犹太复国主义不等同于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欧洲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在中东选定的地区实现自我重生,不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战略价值、自然资源或生产能力,而完全出于犹太人与该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相联系。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性质是平民化的,是完全内向化的,只指向犹太人自身,犹太复国主义缺少欧洲殖民主义在北美、亚洲和非洲传播基督教,迫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初衷”。<sup>③</sup>

进入 21 世纪头 10 年,学界还出现了“后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Post-Zionist),年轻一代学者的研究又发生了转向。这一群体基本上抛弃了后殖

① Shlomo Sharan, ed., *Israel and the Post-Zionists: A Nation at Risk*,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3, p. 10.

② Tuvia Friling, “What Do Those Who Claim Zionism Is Colonialism Overlook?” in Eliezer Ben-Rafael, Julius H. Schoeps, Yitzhak Sternberg, Olaf Glöckner, Anne Weberling, eds., *Handbook of Israel: Major Debates*,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p. 856.

③ Derek J. Penslar, “Zionism,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3, 2001, pp. 84, 91, 96.

民理论,对于“揭露诸如关于以色列建国的集体神话等问题兴趣索然,对此前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政治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下降,他们转而把研究重心放在以色列普通人的个体史上”。<sup>①</sup>

#### 四 新旧史学家之争的国际回响

新旧史学家争论的议题,尤其针对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不仅在以色列,也在国际学界引发了热议。

巴勒斯坦学界对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积极回应。比如巴勒斯坦学者萨利赫·阿卜杜勒·贾瓦德(Saleh Abdel Jawad)认为所谓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接受了旧约预言中“应许之地”的思想,为没收土地和驱逐巴勒斯坦人辩护,其中世俗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的讲话和书信充斥着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执念正契合了这一点。贾瓦德认为魏兹曼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主张混为一谈,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这一前提,在1937年开始声称巴勒斯坦人是应许之地的篡夺者,给“驱逐犹太人,甚至将阿拉伯人迫害致死都是合理的”<sup>②</sup>这一借口做了注脚。

再如,巴勒斯坦学者努尔·马沙勒哈(Nur Masalha)认定“本-古里安其实内心默认以色列存在于巴勒斯坦是替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另一种殖民主义”,<sup>③</sup>故而马沙勒哈较为赞赏以色列新历史学家能与自己同声共气。但马沙勒哈又尖锐地指出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和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先天不足,没能触及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核心,“没有发展非殖民化方法,只反映了以色列定居者殖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尤其指出本尼·莫瑞斯依然变相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站在以色列官方叙事的角度,居高临下地俯视巴勒斯坦的历

① Eran Kaplan, “Post-Post-Zionism: A Paradigm Shift in Israel Studies?” *Israel Studies Review*, Vol. 28, No. 1, 2013, p. 143.

② Saleh Abdel Jawad, “Zionist Massacres: The Cre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in the 1948 War,” in Eyal Benvenisti, Chaim Gans, Sari Hanafi, ed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Berlin: Springer, 2007, p. 78.

③ Nur Masalha, *Imperial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The Politics of Expans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 93.

史。但总体来说，以色列学界的学术争论给马沙勒哈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和触动，他转而对巴勒斯坦学者更为不满和痛惜，他无奈地表示“非常讽刺的是，尽管巴勒斯坦国难日（Nakba）<sup>①</sup>是巴勒斯坦人民集体记忆的中心，但在当今社会，只有少数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对这个议题有所涉猎”。马沙勒哈对巴勒斯坦学界的内省源自巴以冲突，双方的成果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以色列学界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以色列方的档案是完全公开的，由国际机构和政治党派完好保存，任何国籍的研究者都可获得；而巴勒斯坦的专业史家人数少，其成果还停留在政府主导下的年代表和大事记。巴勒斯坦包括阿拉伯其他国家的档案公开度和透明度很低，比如埃及的档案就不对历史学家公开，约旦皇家档案馆只允许经过许可的特约学者查阅。而非官方史料，如一些重要信件、日记、回忆录、剪报等也大多在巴勒斯坦人的流散过程中遗失了。这一点，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也对巴勒斯坦的历史记录颇为诟病，认为其是“不可靠的、有倾向性的，有时甚至充斥着幻想”。<sup>②</sup>

巴以之外学界的观点相对比较复杂，尤其是犹太裔、巴勒斯坦裔以及一些西方学者的介入，让新旧争议更显得莫衷一是。

一些犹太裔欧美学者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种殖民主义运动。如加拿大犹太裔学者尼尔·卡普兰（Neil Caplan）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血腥的殖民运动，并且新旧史家之间的争论充分反映了以色列学界的自由程度之高。<sup>③</sup>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以色列事务》（*Israel Affairs*）的创始编辑埃弗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同时具有英、以双重国籍，他认为以色列建国者之一的西奥多·赫茨尔被曲解了，赫茨尔日记中的全文应当是，“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尊重有其他信仰的人，用最严厉的强制手段保护他们的财产、荣誉和自由。对于许多不愿卖出财产、坚持固守土地的人，我们只能

① 一般认为巴勒斯坦国难日是1948年5月15日，即以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形成巴勒斯坦难民潮。

② Nur Masalha, "New History, Post-Zionism and Neo-Colonialism: A Critique of the Israeli 'New Historians'," *Holy Land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0, No. 1, 2011, pp. 1, 3, 26-27.

③ Nur Masalha, "New History, Post-Zionism and Neo-Colonialism: A Critique of the Israeli 'New Historians'," *Holy Land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0, No. 1, 2011, p. 4.

由着他们,而我们应该在其他地区发展商业,我们将树立一个极好的榜样”;<sup>①</sup>“在犹太国家公民中,将没有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或阶级的歧视”。上述言论使埃弗拉伊姆·卡什认为新历史学家“系统地截断、歪曲原始档案文献,以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创造了以色列历史”。<sup>②</sup>

相应地,一些巴勒斯坦裔学者则肯定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性质。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史蒂文·萨莱塔(Steven Salaita)则将“欧洲对北美原住民的殖民行径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提并论”。<sup>③</sup>同样地,萨义德和一些历史学家也对赫茨尔日记中的表述产生了质疑。萨义德说,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概念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并引用了赫茨尔从1895年开始记录的日记:“我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穷人驱逐出境,这是剥夺和遣散巴勒斯坦人的过程。必须谨慎地对穷人进行处理。”<sup>④</sup>萨义德还与多位学者产生了论战,他认为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详细描述阿拉伯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例子(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语言),但同时却闭口不提在任何场合、任何作品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与本地阿拉伯居民的冲突继续对巴勒斯坦实行入侵和殖民这件事。<sup>⑤</sup>

而没有巴以身份的外国学者的观点更为分散,多重思考路径也值得注意。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运用反证法证明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殖民主义,因为鉴于“真正的殖民者——当时西方国家的外国事务办事处、国防部和大型企业都普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sup>⑥</sup>所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南非开普敦进步犹太教会(Progressive Jewish Congregation)的拉比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否认犹太复国

① Raphael Patai, ed.,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trans. by Harry Zohn, New York & London: Herzl Press and Thomas Yoseloff, 1961, p. 88; Edward Alexander, Paul Bogdanor, eds., *The Jewish Divide Over Israel*, Piscataway: Transaction, 2006, pp. 251–252.

② Efraim Karsh, *Fabricating Israeli History: The New Historians*, London: Frank Cass, 1997, p. 55.

③ Steven Salaita, “The Holy Land in Transit: Colonialism and the Quest for Canaan, Dissertation,”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Norman, Oklahoma, 2003, p. v.

④ Michael Prior, *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A Mor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191–192.

⑤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426页。

⑥ 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485.

主义是“殖民者定居的事业”的说法，而是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为国家平权行动纲领，并补充说，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存在从未间断，可以追溯到古代。<sup>①</sup> 美国学者约翰·奎格利（John Quigley）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最初具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逐渐地“利用帝国主义的优势，并且从来不与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站在一条战线上”。<sup>②</sup>

美国学者彭斯拉认为 1948 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压迫土著民族少数派，对脆弱的社会构成政治和文化威胁，但是还不能定义为西方殖民主义。但在 1967 年战争之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关系才变成了真正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人口逐渐趋向平衡，占领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润，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发生了频繁的军事冲突、战争，才开始使用类似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方式。此外，犹太人占据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都是源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并不是要征服人民，但巴勒斯坦的劳动力和市场成为以色列实行经济剥削的工具，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以及控制了数量庞大的阿拉伯人等种种表现，已经构成了殖民政权的形态”。<sup>③</sup> 但彭斯拉又认为，以色列目前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国家，需要进口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出口高科技产品。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计划背后的动机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动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而且与后殖民国家建设的发展世界观也不同。

也有学者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待以色列新旧史学家争论。挪威学者托·伊文德·韦斯特比（Tor Øyvind Westby）认为“尽管新历史学家未能改变以色列的历史叙事范式，但是国际视野下的以色列史学确实发生了变化，争论双方几乎都用英语写作论文，使受众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加强了世界对以色列史学的关注”。<sup>④</sup>

- 
- ① 参见 David Hoffman, “Zionism Is Not a ‘Settler-colonial Undertaking’,” *The Mail & Guardian, South Africa*, Vol. 28, No. 6, 2005.
- ② John Quigley, *Palestine and Israel: A Challenge to Justi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 ③ Derek J. Penslar, “Zionism,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20, No. 3, 2001, p. 97.
- ④ Tor Øyvind Westby, “The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s New Historians;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Master Thesis, History,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Hist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Religion- AHKR, 2012, pp. 93 - 94.

## 五 新旧史学家之争的多面向影响与反思

新旧历史学家的争论给“以色列的历史叙事构建起了一道铁墙”，<sup>①</sup>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以色列史学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官方史学的垄断时代了，新历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从以色列社会和学术界内部生成了对以色列建国以来强势、带有霸权性质的行为的反思，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新旧史学的博弈是一场官方与非官方的、主流与边缘历史叙事的较量。显然，新历史学家比较有限的解构力度不会给旧历史学家带来致命打击。作为以色列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以色列官方也不会容许旧历史学家的压倒性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旧历史学家眼中，新历史学家怀有“跻身学界主流”的雄心，却存在事件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of events）困境，“大多数新历史学家习惯采用演绎法，一般性理论是他们研究的基础，而不是着眼于特定案例和本地数据。而且，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当代修正主义者基本无视‘硬性’事实，没有进行以实在的数据为基础的历史地理考察，而主要依靠与语言表达、文学符号和文化背景类似的‘软性’创见。其结果就是固有的世界观掩盖了客观科学”。<sup>②</sup>新历史学家轻易地把本·古里安和其他以色列计划者的想法，构陷为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扩张计划的确凿证据。他们认为新历史学家所用文献是不恰当的，指责以色列国的原罪，编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当行为，具有强烈的政治驱动力，是亲巴勒斯坦一方的。

新历史学家更发出诘问，“明明是一部殖民史为什么写成了熠熠发光的民族史诗”，莫瑞斯认为这无异于“粉饰罪行”，为了意识形态对史料进行削足适履，旧历史学家书写了犹太人在欧洲和巴勒斯坦的“被迫害神话”，后又作为建国高度忠诚的参与者，经历了1948年犹太国史诗般的光荣重生。

① Brock L. Bevan, "Avi Shlaim on Israel's Various Historie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23, No. 1, 2004, p. 75.

② Ran Aaronsohn, "Settlement in Eretz Israel—A Colonialist Enterprise? 'Critical' Scholarship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Israel Studies*, Vol. 1, No. 2, 1996, pp. 223, 225–226.

他们无法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分离出来，也无法公正客观地考虑他们后来所写的事实。“旧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访谈和回忆录撰写的，充其量只是利用了特意筛选、经过审查的几批文件”，<sup>①</sup> 很少用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故而他们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没有挖掘出真实的历史，是“不诚实、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sup>②</sup> 新历史学家更具备当时盛行于欧美的“新史学”的一些特征，例如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下层民众和少数群体，而不是上层精英身上。但新历史学家的史料运用也不是完美无缺的。2002 年初，本尼·莫瑞斯承认“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撰写《1947 ~ 1949 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时，并没有使用太多新的、多样化的档案材料”。<sup>③</sup> 此外，新历史学家认为以色列官方叙事是对历史胜利者的宣传，但历史叙事并不像好莱坞电影那样结构简单清晰、结局明了，胜利者的叙事模式下的建国日和失败者的叙事模式下的国难日指的是同一事件，这也印证了以色列史学家群体需要动用更多的智慧去审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sup>④</sup>

其次，这场史学争论延伸到大众场域之中，形塑为一场以色列公众史学运动。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否只是殖民主义的又一个化身的争论，从一方面来看是所谓的“新历史学家和批判性社会学家”与“建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争论，<sup>⑤</sup> 但其议题的主旨注定争论不仅圈定在史学界内部，更上升到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合法性的敏感层面，参与其中的不仅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影响力蔓延到大众传媒，记者、专栏作家、各类公众人物、普通民众纷纷参与，在更广泛的公众话语中引起了全民热议，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场紧张而有力的冲突。尽管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

① Benny Morris, *Making Israel*,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p. 14 - 15.

② Benny Morris, *1948 and after: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6.

③ Benny Morris, "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of 1948," in Rogan. Eugene L.,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7.

④ Brock L. Bevan, "Avi Shlaim on Israel's Various Historie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23, No. 1, 2004, p. 71.

⑤ Tuvia Friling, "What Do Those Who Claim Zionism Is Colonialism Overlook?" in Eliezer Ben-Rafael, Julius H. Schoeps, Yitzhak Sternberg, Olaf Glöckner, Anne Weberling, eds., *Handbook of Israel: Major Debates*,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p. 848.

龙 (Ariel Sharon) 曾表示不愿意让新历史学家的观点进入以色列的大中小教育之中, 希望消除新历史学家的影响, 并且加强传统的叙事,<sup>①</sup> 担忧新历史学家的观点会给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带来冲击。但在 1998 年以色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纪念以色列成立 50 周年的系列节目的文案仍汲取了新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即便如此, 新历史学家依然愤愤不平, 认为节目的批判力度不够, 质疑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化行径大多发生在大众传播普及时代, 然而直到 20 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成功地将自己扮演成无辜的受害者。<sup>②</sup> 但反观这次节目何尝不是新历史学家通过大众传媒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广泛的争论已然引发了学术界之外的以色列人的自我认识浪潮。<sup>③</sup> 如学者约夫·盖尔伯 (Yoav Gelber) 坦言对本尼·莫瑞斯之外的新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好感, 新历史学家对 1948 年战争的研究也没有任何贡献, 但他也承认公众言论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冲击。<sup>④</sup> 学校课本、纪念仪式、通俗报刊、流行歌曲和政治家的演讲都成为新旧历史学家争夺的场域。安妮塔·夏皮拉认为争论的积极成果在于“一系列新主题的开放研究已经证明, 新旧史学之争对于以色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合法性至关重要。略显矛盾的是, 以色列研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新历史学家进行辩论的结果, 后犹太复国主义因而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sup>⑤</sup>

学术层面扩展了审视与反思的宽度, 也有益于构建正常的市民社会。但铁墙筑起之后, 隔阂并没能消弭, 裂痕似乎还在加深。2006 年 12 月, 身为知名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 40 多位以色列阿拉伯人发表了联合文件《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未来前景》, 掀起了争论的新高

① Brock L. Bevan, "Avi Shlaim on Israel's Various Historie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23, No. 1, 2004, p. 75.

② Michael Prior, *The Bible and Colonialism: A Moral Critique*,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1997, pp. 170 - 171.

③ Michel Ben-Josef Hirsch, "From Taboo to the Negotiable: The Israeli New Historians and the Chang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2, 2007, pp. 241 - 258.

④ Osnat Shiran, ed., *A War-Sixty Years After*, Tel Aviv: Ministry of Defence Publishing, 2008, p. 42.

⑤ Anita Shapira, "The Debate over the 'New Historians' in Israel," in Eliezer Ben-Rafael, Julius H. Schoeps, Yitzhak Sternberg, Olaf Glöckner, Anne Weberling, eds., *Handbook of Israel: Major Debates*,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pp. 906 - 907.

潮。这份文件的核心观点认定“以色列是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精英进行殖民的结果，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促成了殖民国家的生成。1948年建国后，以色列继续作为西方延伸领地据点，继续与邻国发生冲突，也继续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施行内部殖民政策”，<sup>①</sup>“以色列是所有西方国家的化身，如一把‘匕首’刺入阿拉伯人家园的中心，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西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切邪恶”。<sup>②</sup>不难想象，这份宣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论是以色列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这些历史命题被诸多学者支持并堂而皇之地写进文件中感到异常愤怒。

那么到底如何辩证地看待犹太复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目前国内学界普遍持有较为审慎的态度：不同意将锡安运动看作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而更多地将其视为特殊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个没有国土家园的阜新运动，必然要获取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由于它长期处在反犹运动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包围摧残之下，因此对自身的安全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意识，常会不由自主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去打击对自身的威胁。以艾兰·佩普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定义为殖民主义运动，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评判往往因矫枉过正而走向极端，此类过激主张无疑大大伤害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瓦解着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也给以色列社会增添了诸多的不安定因素，<sup>③</sup>“对以色列国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及存在和理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并削弱了犹太民族精神”。<sup>④</sup>

的确，谨慎地看待新历史学家的作用尤为重要，不能因为新历史学家激烈批评以色列就叫好，而更需要从新历史学家产生的客观作用来看待它的长远价值。不论是新历史学家还是旧历史学家，其身份首先是以色列人，其次才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秉持勇于打破学术禁忌的决心，

①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eads of the Arab Local Authorities in Israel,” *The Future Vision of the Palestinian Arabs in Israel*, p. 8.

② 何志龙：《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 李晔梦：《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研究——以以色列新历史学派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14。

④ 王健：《艾兰·佩普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载〔以〕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XIV、IV页。

更力图为以色列由来已久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使得争论具备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新历史学家大多陷入了过犹不及的窠臼之中，重构民族记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经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两个已经产生巨大裂痕的民族想要重塑国家情感，轻易就会触碰到以色列人敏感的神经，结果传统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指责他们捏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恶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学者指责新历史学家粉饰犹太复国主义行为不端的真相。夹在右派传统史学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史学家中间的新历史学家本应发挥调和、沟通、斡旋之类的“搭建桥梁”的作用，但他们没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以色列国家历史叙事被撕裂了。学者们被迫“站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划归到对立阵营之中。据此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宝拉·卡保罗（Paula Kablo）的观点可能更具指导意义，她认为1948年之后以色列人短时期之内更加具有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认同，而从长远看来他们也就有自信去面对源自内部的自我批判的声音。

以色列“新旧历史学家”争论基于对自身民族经历断裂与伤痛的历史，在公共场域中交锋，尤其在面对殖民主义的敏感议题时，不应完全寄托于单方面的历史叙事或意识形态宣传。壁垒分明、立场迥异的叙事主体如果能更多地进行自省，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对方，必将有利于学术进步和民族团结。多元叙事是搭建以色列国史的基石，以色列史学界不应当抛弃这一优秀的传统。从现实意义上看，以色列不仅需要现代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需要兼顾历史延续性，最终形塑民族政治共同体认同，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诚然，争论应该还会继续，如何理性讨论使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自洽，改变共识缺席的现状，更进一步如何以学术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依然是摆在以色列历史学家面前的巨大课题。

[责任编辑：张玉友]